

Sacrificial Rite of King Temple in Baijing village, Pingding Country

平定县柏井村大王庙祭祀习俗考

文 / 刘 霄 Liu Xiao

摘要: 平定县柏井村大王庙庙会是以明灵大王和狐突老大王为祭祀对象的民间信俗活动,主要仪式过程包括降旨、迎驾、扭架、献艺、开山等程序,同时还伴有民间演剧形式。本文通过对大王庙修建历史、祭拜仪式等问题的阐述,发掘庙会祭祀所包含的民间文化内涵,为山西地方信仰研究提供宝贵的民俗资料。

关键词: 大王庙; 祭祀; 仪式; 祈雨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652 (2014) 03—0033—04

一、大王庙祭祀活动的形成原因

大王庙旧址建在平定县柏井村东山上,主要祭祀神祇为晋国大臣狐突,当地百姓又称其为狐突大王庙。狐突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因晋国内乱,狐突二子狐偃、狐毛追随重耳出亡,狐突因拒绝执行召回二子之令,遭怀公杀害。后世感其忠义,遂立庙祀之。今平定境内多建有狐突神祠,并且民间还流传有狐突御戎的传说,百姓则以狐突为村镇守护神加以祭拜。残碑《初建太傅灵应祠记》记述了庙宇修建始末,明嘉靖庚申年(1560)大旱,柏井村民在东山翠龙台处祷祀,不久禾苗普得甘霖;隆庆己巳年(1569)又大旱,村民郗世才率领众人又去祷祀,雨露复至。后来,大家觉得是狐突大王显灵庇佑,所以在祭祀地为其修建了庙宇。相传农历七月二十日是狐突大王诞

辰,当日由香爷(组织者)牵头,率领四方百姓进庙朝贡、许愿上香、祈福禳灾、演剧酬神;如遇旱情,还伴随有盛大的祈雨、取水仪式,年代日久,遂形成大型庙会。《平定州志》卷五载,本地“俗多淫祀,虽孤村僻野,赛神演戏无岁无之,其村落大者,无月无之……每当祀期,附近村庄扮演杂剧,十百为群,相引而至,名曰上会……其祈雨酬神亦如此。”^[1]^(p168)入清后,百姓在金龙山重修大王庙,并将狐突大王金身安放于寺庙后院的配殿中。自此,庙会、祭祀等活动遂在新庙处开展,老庙因年久失修、偏僻难行,香火渐衰,近年来已鲜有人问津。

金龙山大王庙的正式名称为明灵大王庙,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明灵大王庙碑记》载:“州治东五十里许古柏井镇有明灵大王神祠,其神专司雨泽,考系明朝功臣总兵陶,敕封太师太保、明灵大王。自我朝定鼎之初,显神光于柏井。”^[2]关于这位陶总兵的真实事迹,已无从考证。碑文中记载了一则关于陶大王九江口显灵搭救戴公的民间传闻,主要是为了印证“神明感应”,增强对民众的感召力。大王庙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庙宇坐西向东,两进院落,现存正殿、献殿、月台、牌楼、南北配殿、山门、钟鼓二楼、戏台等建筑。庙内现存清代碑刻17通,碑文多记载大王神明应灵、庙宇修葺补建以及民间迎神赛会之事。



▲ 大王庙

古代平定地区水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农业生产丰歉无常。道光二十七年（1847）《乐输小引》碑文记载：“嘉靖三十九年之旱，则逃亡过半，镇人任公镗记之；万历二十四年之旱，则质妻鬻子，卢公亮等记之；乾隆二十四年之亢旱瘟疫相继，卢公来复记之，语长心重，不惜苦口……道光十五年五月，尽乃雨。八月初，严霜杀禾，岁仅一分，斗米价至千余；次年，岁可五分，民食仅支冬月。”^[3]结尾处又说“今年六月亢旱，至八月初旬雨始，沾足乃十四五日，大风二日，年又不登矣。”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百姓无力面对连年灾祸，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希望借助神灵法力消灾纳福，于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大王庙会中，民众在香头的组织下向两位“专司雨泽”的大王“祈晴祷雨”，新版《平定县志》中对这一盛大场面作了详细描述：

旧时，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为县城庙会。凡遇久旱不雨，人心惶惶时，县城七街绅士便商聚一庙共议请驾祈雨事，多邀请柏井名灵庙陶侃大王和狐突老大王出巡。直至民国初年，每于迎请，县城官吏绅士亦骑马乘轿前往。迎驾时，先将大王出巡之帮身使者马界压（押）来，其时马界蓬头垢面，光膀赤足，突奔前后，侍架而发；旋即，将神像抬出，村夫持“回避”、“肃静”骑马牌分列左右。一声打道启程，先有黄门小侍鸣锣开道，旗队、伞队、炮队、锣鼓队拥动其后，紧接銮驾护卫，祈灵乡绅一路在内廷僧人引导下“三步一跪拜，五步一烧香”，沿途十里一换班，轮番执事迎春进城，经东关应公庙前，至西关雨花台落架。继而设贡，祈雨仪式开始。^{[4](p569)}

明清以来大王庙祭祀活动的相关资料，特别是碑刻中关于大王崇拜以及迎神赛会活动的记述，为了解当地民间信仰的生成、演变，古代雩祭的仪式过程，神诞日祭祀献艺形式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文字史料。

二、大王庙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

柏井庙会每年从农历七月十五拉开帷幕，至七月二十三日结束，直接参与人员多达80余人，仪式过程包括降旨、迎驾、扭架、献艺、开山等程序，同时唱戏三天。

七月十五日，百姓带香纸、供品（面粉发酵后蒸

捏的“面羊”），到庄稼地供奉五谷神，并将祭拜过神灵的“面羊”送给外甥们吃食，保佑其平安成长。

十六、十七日，善友们开始打扫庙宇、戏台，联系戏班，并为演员安排住处。

十八日，杀猪、起菜，购买各类食蔬，因为在祭祀过程中有诸多禁忌，所以往往在活动未开始之前，先将食材置办齐备。古时酬神仪式中有五不准：不准宰牲、不准买卖肉类、不准买卖葱蒜、不准携带雨具出门、不准货郎摇拨浪鼓。

十九日，盘火、请厨，为组织者及演员做饭。

二十日，善友们到寺庙摆放供品，面蒸供品有：三牲、十二生肖、石榴、佛手、蛇盘兔、鱼戏莲、五福捧寿等；鲜果供品有：瓜、桃、李、枣、石榴、苹果等。从这天开始，前来上香许愿、还愿的人络绎不绝，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小商小贩、耍把式卖艺者齐聚柏井。

二十一日，戏班演出，在大王庙戏台和柏井村舞台同时起戏，以中路梆子为主。村中旧规：献演剧目必须喜庆祥和，服丧之人不能参演，剧中亦不许有祭奠场面出现。头场戏必须以晋剧《打金枝》开始，而且女性不能入寺观戏。下午，马界扮演者蓬头赤足从村中跑至大王庙，口中念念有词，众乡绅父老跪拜，马界开始代神授旨，大意为：州镇灾情严重，本王明日要下山巡视，列请众人准备抬架，明日下山。

二十二日子时，众人来到大王庙殿前焚香烧纸，把明灵大王请上四驾（四人抬）、狐突老大王请上八驾（八人抬），出庙巡游。抬驾人在路上要不停地扭动、转圈、摇摆，途中不能停歇换人，当地流传有“八驾好迎、四驾难抬”的说法。州城百姓沿途参拜，不断有人献写“泽被万民”、“护佑一方”、“感应山川”、“威灵乡里”、“庇佑黎庶”等字样的红布帐幅和匾额，焚香祭拜者层出不穷。附近村民都要来迎驾上会，并伴有各式演出，如社火、跑马、抬阁、旱船、太平车、老绵鱼、二鬼抱跌、踩高跷、旗伞旗鼓、幢幡、秧歌等，其中最为独特的艺术形式为扇鼓舞，表演者多为妇女，手持直径、柄把均为尺许的圆形扇鼓，三五不等，群聚而舞，口中呀呀有词，皆为劝人皈依、弃恶行善之内容，边击边舞，唱

白含混模棱，曲调古怪稀奇。

马昇要在四驾、八驾之间穿梭往来，右手的三环刀上下乱舞，左手不时将麻鞭甩得叭叭作响，来到东关应公庙时，会突然在人群中打开一个空场，然后跪在地上，用三环刀朝自己的脑门连劈三刀，顿时血流如注，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民众见状，纷纷跪拜，马昇起身代神宣旨，然后昏厥。执事人赶忙用“黄薄纸”贴住刀口，片刻，马昇苏醒，其举动如初。马昇的这一“下神”表演俗称“开山”，以显示神灵附体，与民同乐。接下来的取水仪式与县志里记载相同，不再赘述。整个活动中最惊险、最刺激的环节属于马昇的“下神”表演，当地民众称之为“魔马昇”。“魔”、“压（押）”音近，县志中将其解释为“押解”，而“魔”的本意为睡梦中的惊恐状，在这里将其理解为马昇风魔、癫狂之形态似乎更为合适。马昇，即神汉，通灵者，这类角色一旦被神灵附体后，便显得异乎常人，为了表现其超常法力，他们经常用利刃自残，有的地方还能表演吞刀吐火，令人望之惊骇。山西多地保留有这种表演形式，各地叫法不一，洪洞“三月三”迎神赛会将其称为“马子”，昔阳武社火中称为“马裨”、“马庇”，虽然各地名称不同，但从其表演形式和代言本质上讲，大抵都是原始宗教巫觋之遗风。

三、大王庙祭祀活动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及心理

柏井大王庙会是融迎神赛社、祈雨祭祀、演剧酬神为一体的民间信俗活动，通过对碑刻、方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古平定州官民同祭的仪式过程，并从中窥测出古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取向。

迎神赛社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民间祭祀活动，其源头始于对土地的祭拜，后来与社火、宗教仪式等相融合，遂形成今日丰富多彩的民间娱乐形式。“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5](p188)}封土为社，栽种其土所宜之树，以为祀社神之所在，因此社又具有祭祀场所、社坛之意。土是立社之本，君王

分封诸侯，用茅草裹社坛五色土分与，诸侯得到帝王封赐便有了自己的领地，社进而又被引申为疆域、权力之意。《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6](p1589)}社同时也是地方基层组织单位，周以25家为社，汉以100家为社，元以50家为社，可见社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并不固定，朝代更替便会引起其内容、组织的变化。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以行业组织为祭祀单位的“社”或“会”，而今天我们将一切主持祭祀神活动的民间组织都叫社，不再局限于古义。

古代社会，国家祭祀有固定的日期，称“社日”。农业祭祀活动一般选择在春秋两时，即春祈秋报，先祈求丰产，后答谢回报，即使遇有大丧之年，仍不敢废辍。国之社祭，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要参与，整个仪式庄严而隆重，天子、诸侯还要亲自致祭，并向神灵献牲、献乐。上行下效，民间对天地神祇的祭祀显示出更大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凡群众所喜皆可用来献神，凡民众所乐，均以乐神同享，并且仪式活动逐渐与岁时节令、人生礼俗、神诞日、雩祭、蜡祭等相融合，成为里社祭祀的一部分。明清以降，社祭与其它宗教活动进一步融合，终于形成了规模浩大、内涵丰富的迎神赛社。通过此活动，人民一方面祈求上苍保佑，另一方面，在劳动之余借此庆祝，借娱神的名义来娱人。

民间的迎神赛社具有泛神化祭祀特点。初民的信仰只囿于天、地、日、月、山、水等自然神祇，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并且希望通过祭拜某种与自然现象相关联的神物来祈求福祉。《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6](p1369)}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进一步提高，先民的原始思维逐渐被多神信仰所打破。唐代以后，神祇的地方化凸显，民间“不论何人，如果生前其具有道德操守并对社会有过杰出的贡献，那么身后就有机会成为当地的保护神。”^{[7](p5)}至明清，民间信仰的地域性特征完全形成，今柏井大王庙祭祀正是明清以来迎神赛社、献艺

酬神的范例，狐突以忠义不二闻名于晋，当地又盛传其御戎故事，光绪版《山西通志》中还有该神“专司雨雹”的记述，所以，无论从人缘、地缘、还是从神职上讲，狐突大王都是当地祭拜人物的首选。然而，入清后，明灵大王影响日益增大，百姓也乐于相信其“司职导雨”、“神灵感应”的传闻，于是，在庙会中民众向两位大王共同祭祀、祷告，民间这种众神共祀、并行不悖的做法正是迎神赛社多神信仰的体现。

大王庙祭祀活动中的“魔马祈雨”仪式包含着原始巫术因子。古人认为，巫拥有超自然神力，能够沟通天人，充当神祇的代言者，为民降福。马舛，即古代巫覡的演化，他们可以与神灵遥感相应，并且通过施行一定的行动或吟诵特别的语言、使用特别的道具驾驭和支配超自然力量，以此获得所期待的结果。这类感应巫术本身与求雨并无太大关联，但是民众正是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的仪式过程来寻求心灵的慰藉，一方面可以暂缓因旱情而导致的焦躁心态，另一方面能够维系动荡的社会关系，至于结果如何，已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久旱必雨是自然规律，然而人们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只能用祭祀、祷告来祈求上天怜悯，并幻想着与神灵对话，让其体恤民间苦难，借以祛除灾祸，民众的这种“天人感应”观念正是祈雨习俗长久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抬神驾出巡游街是一种常见的祈雨方式，这种方式多由民众自发组织，祭拜、请神、出巡，一方面表

现了民众祈雨虔诚之心，另一方面也含有抱怨之意，其目的就是要惩罚神灵莫不关心，逼迫其出巡访灾，解救旱情。旧时，河南淮阳、山东陵县、陕西渭南等地均有此俗，虽然各地祈雨规模繁简不一，但主要仪式过程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先由巫扮神，接受众人祈拜，然后由乡人护送神架查看灾情，同时伴有鼓乐，接下来会首或社首陪同巫人去村中查访，每到一处巫人都要用刀剑、麻鞭等物玩耍表演，以示附体，同时村人亦为神灵献上各式表演，并且不断有代表向巫人诉求，要求降雨。这时，巫代神言向众人宣旨，大意先是谴责人类各种不义之举，导致天怒不雨，最后表示愿为施雨，解救苍生。之后，有的地方当下即由巫人定下降雨日期，有的地方还伴有“取水”等象征仪式。整个祈雨过程中，巫扮成掌管风雨的神灵，表演惊险刺激的附体技艺，接受群众拜祀，并代神宣言，所有这些模仿神灵的行为都具备了戏剧表演的要素。

柏井庙会祭祀活动反映了平定地区传统农业耕种的历史状况和当地水利、地貌、气候等生态环境特征，表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灾害的畏惧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神崇拜信仰。虽然，古人的祈祷仪式是一种荒诞不羁的迷信活动，但是透过一系列仪式符号和象征行为展示出丰富的人文内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赛会祭祀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责任编辑：杨秋梅）

参考文献：

- [1] 赖昌期修，张彬、沈晋祥纂. 平定州志 [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 [2] 碑高 210 厘米，宽 77 厘米，侧宽 20 厘米，圭首方跌，碑阳额题“重修明灵大王庙碑”，现存正殿廊下，保存完好.
- [3] 碑高 116 厘米，宽 57 厘米，侧宽 14 厘米，螭首方跌，碑额无字，现存于山门下，保存基本完好，碑一角有残损.
- [4] 平定县志编纂委员会. 平定县志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 [5] (东汉)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 风俗通义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 礼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范丽珠. 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中国 [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刘霄（1980—），男，河北沙河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